

章太炎传

许寿裳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章太炎传

许寿裳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章太炎传 / 许寿裳著. 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9.7

ISBN 978-7-5306-5173-5

I. 章… II. 许… III. 章太炎 (1869 ~ 1936) - 传记
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395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6 插页 2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5000 册 定价: 30.00 元

前言

——作为著述家的许寿裳

陈平原

一 文学家还是著述家

作为教育家的许寿裳(1883—1948),已经日渐隐入历史深处;而作为章太炎弟子、鲁迅挚友的许寿裳,则仍然被广大读者所记忆。这自然是“立言”的结果——只要你稍微涉猎章太炎或鲁迅研究,就很难回避许先生所撰《章炳麟》(本书更名为《章太炎传》,下不再注——编者。)(1945)、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》(1947)、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(1947)、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(1952)等。在这个意义上,说“许寿裳先生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”,或者称“许寿裳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专家、作家”,也无不可。

不过,一般人所理解的“文学家”,大都是才情横溢、文采风流,与许先生的诚挚、笃实、平淡、自然,相去甚远。更何况,许先生不以驰骋想象见长,所撰多为“实录”性质的传记或回忆录。因此,称其为“著述家”,或许更稳妥些。那样的话,我们可以转化视角,在学术史上,而不是在文学史上讨论许先生的贡献。

去年逝世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,对许著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等赞不绝口,称其“是有关鲁迅的重要文献,而文笔淳朴,亲切动人,其本身也富有文学价值”;而近年活跃于学界及文坛的孙郁,对此也深有同感:“我读许氏的著作,深感其温和敦厚之气,内中有着质朴、纯正的风韵。许寿裳国学根底深,又通西学,故对鲁迅的感知,视界开阔,不拘于凡俗。虽然缺少哲人的目光,对鲁迅精神深广之处探颐有限,但对其人品、文风、境界的把握,独到深厚,非外人可及。”对于这些表彰许著的文字,我心有戚戚焉;只是谈到单靠这几本好书,能否“使许先生厕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家之林而毫不逊色”,我始终有些犹豫。

说白了,我对于许寿裳先生的文学才华,其实是颇有怀疑的。与鲁迅、许寿裳交往甚多的孙伏园,曾用小说笔法,讲述许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逸事:

在东京求学时代,鲁迅先生兄弟与许先生同居一处,许先生于学术研究之余,亦颇有志于创作。一夕,他对鲁迅先生说,今晚一定要创作了。鲁迅先生见他亲自到西洋料理店去买了点心来,而且亲自准备咖啡,鲁迅先生兄弟相约不要去扰乱他。等到夜深人静,鲁迅先生将要睡觉的时候,偷偷地去窥探他的创作已经有了多少。出人意料,鲁迅先生说:“西洋点心只吃了一块,咖啡已经冷了,季鹈靠在桌上睡着了,而稿纸还是空白的。”

既然是逸事,难保没有“艺术加工”的成分。不过,如果了解当初许寿裳曾与周氏兄弟等相约,筹办《新生》杂志,这故事或许还有些影子。我甚至还怀疑,这故事的讲述者,很可能就是鲁迅,因其幽默中包含着善意,不伤人,但很能见性情。

本不以文学见长的许寿裳先生,受尊师章太炎的教诲、挚友鲁迅的感染,再加上那人普遍良好的古文修养,一旦著述,颇见神采。换句话说,许先生回忆鲁迅等书之所以可读、可传,“工夫在诗外”。因此,我主张暂时搁置其“文学技巧”或“修辞手法”的探讨,也无须汲汲于将其抬进本就相当拥挤的“文学殿堂”。

二 从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到《章炳麟》

读过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的,大概都会记得该书第七节“从章先生学”。此文以及鲁迅的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、周作人的《知堂回想录·民报社听讲》、任鸿隽的《记章太炎先生》、刘文典的《回忆章太炎先生》等,都涉及了令人神往的章太炎东京讲学。其中,许寿裳的“追忆”,是“始作俑者”。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明明迟至1947年方才出版,为何将其置于鲁迅的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之前?那是因为,“从章先生学”一节的轮廓,其实早就见于十年前的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。

熟悉鲁迅著述及史迹的朋友,大概都知道,鲁迅撰于1936年10月的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,与许寿裳撰于1936年8月的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,关系极为密切。一强调“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,同时是国学大师”,一称“我以为先生的业绩,留在革命史上的,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”,二者互相发明,配合默契。细读文本,你还会发现,鲁迅的引录《狱中赠邹容》、《狱中闻沈禹希见杀》二诗,摘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(“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,增进国民的道德;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,增进爱国的热肠”),以及专门提及章先生为八人小班讲授《说文解字》等,都是依据许寿裳文章提供的资料。

叙述角度颇有差异,文章境界也显高低,但鲁文基于许文的提示,这点毫无疑义。撰写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这篇名文前半个月,鲁迅曾给许寿裳去信,其中有曰:

得《青苗》,见兄所为文,甚以为佳,所未敢苟同者,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。

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,卅年前事,如在眼前。因思王静安没后,尚有人印其手迹,今太炎先生诸诗及“速死”等,实为贵重文献,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,汇印成册,以示天下,以遗将来。

章太炎的狱中诗,许寿裳编《浙江潮》时曾予以刊出,“原纸至今藏在行篋,弥可珍惜”;至于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,许文竟抄录了整整四页,原因是:

此演说录,洋洋洒洒,长六千言,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,全文曾登《民报》第六号。而《太炎文录》中未见收入,故特地多抄如上。

许寿裳的这些追忆,显然很让鲁迅动容,也因此勾起了不少陈年往事。对比鲁迅之抱怨浙江所刻《章氏丛书》,“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,竟多被刊落”,以及称“先生手定的《章氏丛书》内,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”,“其实是吃亏、上当的”,与许文的上述表达,可谓若合符节。

至于鲁迅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的“欲以佛法救中国”,指的是许寿裳文章中的这么一段话:

现在中国虽称民国,而外侮益亟,民气益衰,一般国民之怯懦浮华,猥贱诈伪,视清末或且加甚,自非一面提倡佛教,“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,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,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,以力戒诬语治诈伪心”(先师《答梦庵书》中语,见《民报》第二十一号),一面尊重历史,整理国故,其不善者改良之,善者顶礼膜拜之,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心,前路茫茫,何能有济?

对于鲁迅的批评,许寿裳是口服心服的。日后所撰《章炳麟》一书,虽设专节谈论章太炎“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”,却不再发挥“佛法救国”的空想了。

其实,这段“公案”,许寿裳本人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第十三节“看佛经”中,已经公开挑明。除了全文引录鲁迅去世前24天写的这封长信,许寿裳还对同是读佛经的太炎先生师徒,下了这么个断语:“先生和鲁迅师第二人,对于佛教的思想,归结是不同的: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,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。”

三 兼及“革命元勋”与“国学大师”

从善如流的许寿裳先生,显然很看重鲁迅的这封回信,日后撰写《章炳麟》,不只不再妄谈佛法救国,更重要的是,一再强调章太炎的革命家身份,希望其不被“国学大师”所遮蔽。而在我看来,许的这一坚持,与其对鲁迅的尊崇与信任大有关系。

1944年9月,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来信,邀请许寿裳为其主编的丛书“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”撰写《章炳麟》一书。虽“山居无书参考,颇费踌躇”,许还是当仁不让,开始四处寻觅资料。好不容易借到1936年《制言》杂志的章太炎先生纪念专号,上面既有许的《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》,也有诸多师友的怀念文章,《章炳麟》的撰写,这才得以顺利展开。半年后,全书杀青,在寄稿的同时,许寿裳给潘公展去信(1945年3月31日),郑重声明:

章先生为革命元勋,同时为国学大师,世人仅注意后一点,不足以明真相,拙稿双方并重,而文字力求简要,删而又删,成此字数。

同年11月,应邀为《教育全书》撰一万五千言的“章炳麟传略”,交稿时,许寿裳同样奉上一“附带声明”:

章先生为国学大师，著述精深独到，三百年来无第二人，贡献于学术上及教育上者甚大。又为革命元勋，惜世人多不明了。今拙稿于此双方兼顾，而文字力求简要，删而又删，故不超过所限字数。

如此叮嘱再三，可见许先生对此兼及“学问”与“革命”的论述策略，是何等重视。

主编“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”丛书的，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，将章太炎置于第三辑“学术先进”，很大程度是全书体例使然。潘公展为这套丛书所撰“编纂旨趣”，称：“我认为建国文化是建筑在两大基础上：第一是发扬固有的优良文化，从根救起；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学工艺，迎头赶上。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个基础上的许多基石之一。”至于选择“基石”的标准，不外传统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与此相适应，也就有了第一辑“民族伟人”、第二辑“历代贤豪”、第三辑“学术先进”的区分。

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相当可观，或者当时已成名家，或是日后大有发展。1946年南京版《章炳麟》后面，附有该丛书的总目，值得选摘（括号里面是该传的作者）：第一辑“民族伟人”共九种，包括黄帝（钱穆）、孔子（黎东方）、秦始皇（顾颉刚）、汉武帝（缪凤林）、唐太宗（罗香林）、明太祖（吴晗）、孙总理（邹鲁）等；第二辑“历代贤豪”共十五种，包括勾践（卫聚贤）、诸葛亮（祝秀侠）、武则天（蓝文徵）、岳飞（邓广铭）、文天祥（王梦鸥）、郑成功（郑德坤）、洪秀全（罗尔纲）、林则徐（魏应祺）等；第三辑“学术先进”共十五种，包括老子（张默生）、墨子（罗根泽）、屈原（游国恩）、司马迁（汪辟疆）、韩愈（李长之）、玄奘（苏渊雷）、徐光启（方豪）、顾炎武（谭其骧）、曾国藩（萧一山）、梁启超（吴其昌）、章炳麟（许寿裳）等。细察丛书的整体框架，置章太炎于“学术先进”，定位其实相当准确。况且，对于许著的兼及“革命元勋”与“国学大师”，主编并无异议。

以弟子身份为尊师作传，好处是见闻真确，态度虔诚，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；可也面临很难回避的陷阱，那就是“为尊者讳”，拼命拔高，言过其实。比如，称“章先生学术之大，也是前无古人”，这样的说法，便很难让人信服。好在接下来的具体评说，还是很有见地：

独有先生出类拔萃，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，然而以朴学立根基，以玄学致广大，批判文化，独具慧眼，凡古今政俗的消息，社会文野的情状，中印圣哲的义谛，东西学人的所说，莫不察其利病，识其流变，观其会通，穷其指归。“千载之秘，睹于一曙。”这种绝诣，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人，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。

熟悉章太炎著述的读者很容易发现，这些品鉴，大都是借用或化用章氏本人的自述。这正是此书的最大特点：熟读《章氏丛书》，大量摘引原文。如此“以章说章”，对于学术评传来说，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。其实，这种写作，大有来头，追摹的是黄宗羲、全祖望的《明儒学案》、《宋元学案》等。

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提及清代的谱牒学，称自撰年谱价值最高，其次便属“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”，“因时近地切，见闻最真也”。而“可以观一时

代思想”的“学者之谱”，要想写好，并不容易：

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，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（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，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），贯穴钩稽，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。不宁惟是，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，悉当留意。不宁惟是，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，无一可以忽视。

以我的观察，许寿裳之为尊师作传，所凭借的学术资源，并非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式的“传记文学”，而是清人的“学案”以及梁启超所评述的“学者之谱”。

《章炳麟》一书，最见功力的，无疑是“革命元勋的章先生”和“国学大师的章先生”两章。可第一章“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”，这大帽子的功能，一如梁启超所说的：“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，无一可以忽视”；至于第四章“先生晚年的志行”，涉及章太炎晚年的日常生活、学术兴趣以及政治立场，是全书的补充，也是必要的强调。全书的结构很特别，始终将政治史与学术史的思路扭结在一起，不即不离。落实到具体事件，便是不完全遵从时间顺序，随时“按下”与“提起”。比如，第二章讲述章太炎《民报》时期的工作，故意按下最为精彩的为鲁迅等讲学不表，留给了第三章，以便突出其“革命不忘讲学”（第十四节的题目，真的就叫“革命不忘讲学”）。而在第四章设“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”专节，既符合全面抗战这一著述背景，同时再次凸显全书宗旨：章太炎不仅仅是“国学大师”。考虑到丛书第三辑的命名——“学术先进”，这样的提醒十分必要。

四 传记文学与师友情谊

在追忆许寿裳先生时，孙伏园说了这么一段话：“章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们，既不忘师说，也不泥师说，日有进境而成为纯科学态度的学者的，许寿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。”笼统地说许先生学业有成，那没问题；可要说章太炎的弟子中“不泥师说”且“日有进境”者，许先生其实算不上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宣统二年（1910）则，提及其亡命日本时之“提奖光复，未尝废学”，称：

弟子成就者，蕲（州）黄侃季刚、归安钱复季中、海盐朱希祖逊先。季刚、季中皆明小学，季刚尤善音韵文辞。逊先博览，能知条理。其他修士甚众，不备书也。

太炎先生一贯特立独行，评论时事以及品鉴人物，不太受流俗影响。在“自定年谱”中，不提声名显赫的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，有政治立场歧异的缘故；但更重要的是，从专业角度考量，这三位“文化名流”都不能算是其“得意门生”。鲁迅说，“先生的音容笑貌，还在目前，而所讲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却一句也不记得了”，并非只是自我调侃。章太炎对于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的影响，主要在思想与人格，而不是具体的文字学知识。鲁迅撰有《门外文谈》，也有编《中国字体变迁史》的计划，但并非以此名家；许寿裳去世前一年为台湾大学中国文

学系二年级学生讲授“文字学”，课余编著《文字学概要》讲稿，可也说不上光大师门。

作为学者的许寿裳，虽有若干教育学文章，以及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》、《历代考试制度述要》等著作传世，但都说不上十分精彩。真正让读者难以忘怀的，还是《章炳麟》、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等传记作品。好友台静农在《追思》一文中，提及许先生谦冲慈祥、临事不苟的个性，以及弘通致用的学术风格，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：

先生一生与章太炎、蔡子民、鲁迅先生关系最深，这三位先生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师，以先生长于传记的文笔，不幸仅写出章先生一传，蔡先生传尚未及下笔，鲁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记一书，而一代文献所寄的前辈，竟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，事变之来，真不知从何说起。

称许寿裳乃“一代文献所寄”，表彰其“长于传记的文笔”，我以为是知人论世。实际上，日后学者之褒扬许先生文章“朴实淡雅，具有一种自然之美”、“言简意赅，毫无渲染”、“他的叙述既客观，又有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”等，指的也都是这几种传记作品。

说到“传记”写作，自然不能忽略许先生曾在大学开设“传记文学”课程。据许世瑛编《先君许寿裳年谱》，我们知道，1940年就任华西大学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时，许先生开设的课程是《传记研究》和《中国小说史》；同年5月2日撰有《谈传记文学》一文，只是未详出处。可以说，在生命的最后十年，许寿裳的学术工作，主要围绕传记的研究与写作。至于具体成果，除了广为人知的章太炎、鲁迅的传记，还包括《〈宋平子先生评传〉序》、《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》、《蔡子民先生的生活》、《俞曲园先生的思想》和《李慈铭〈秋梦〉乐府本事考》等。单从表面上看，文体五花八门，有序，有考，有回忆，也有评述，但大的思路相当一致，那就是借对于乡里先贤或师友的生平及著述的考辨，展开人物研究。广义地说，这些都可以称作“传记写作”。

读袁珂的《悼忆许寿裳师》，我们大致能领会到，许寿裳先生的“传记文学”课程不是很成功。只有两个学生，可“许师却一丝不苟，每上课前一定要在图书馆里钩稽群籍，作充分的准备”；有一回只剩下袁珂一人，面对如此难堪局面，“许师却从容一如平时，干脆不去写黑板了，而把他写好的讲义，放在我的课桌上，亲身站在我面前，认真讲课直到下课铃声叮当叮当地响起来”。这些描述，固然显示许先生教学的认真，以及处变不惊的绅士风度，可另一方面，也让我们体味到其内心的寂寞。许先生认真编写的“传记文学”讲义，未见行世；但这一不太成功的“研究”，对其写作却很有意义。

要说许先生的传记写作，相对于其学术准备，我更看重的是“师友情谊”。孙郁表扬过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的文采与气象，后面还有一句：“鲁迅有这样的知己，可谓幸事。”这是从著作方面立论；反过来，正因为有了鲁迅这样的知己，方才成就许寿裳的文章。文章的好坏，固然依赖于个人才情，但与描写对象不无关系。全祖望《梨洲先生〈思旧录〉序》，劈头就是：

予尝谓文章之事，不特藉山川之助，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。

这话大有讲究。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,从小见识各种非同寻常的人物,眼界很高,其追怀朋好,杂糅见闻,这样的文章自是有别于小桥流水、小家碧玉。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,梁启超特别赞扬全祖望“最会描写学者面目”,比如说黄梨洲、顾亭林、刘献廷、钱谦益、毛奇龄等,都是三言两语,就能写活一个人。所谓全氏“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,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,其识力与技术,真不同寻常”,固然在理;但还必须考虑到,这些当世第一流人物,本身行事特异,性格鲜明,确有可写处。换句话说,不管是黄宗羲的《思旧录》,还是全祖望诸多慷慨壮烈的碑传,确实是“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”。

同样道理,许寿裳的传记作品之所以可读、可传,与其得天独厚的师友交谊大有关系。据许世玮《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》称:

在他被杀害前不久,他与我在院子里闲聊,当谈及他的著作时,他忽然说:“我有鲁迅、蔡元培先生这样两个知己,一生总算没有白过。”说这话时态度非常庄重,我听了不由得一愣。是啊,有这么两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人为知己是光荣的,也值得自豪!

这虽是家属几十年后的追忆,但大致可信。对于许寿裳来说,“值得自豪”的,不仅仅是蔡元培、鲁迅这两位知己,还有宋恕、章炳麟这两位尊师。据《鲁迅研究资料》第14辑,许寿裳残留的自传手稿,恰好谈的是“余年十九在杭州读书,最得益的老师是宋平子先生”,以及留学东京时,“曾于每星期日到太炎先生寓所听讲小学”。

许寿裳对这二师二友,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1937年,应夏丏尊之邀,许为《中学生》杂志撰稿,批评何健的“明令读经案”,称:“我对于嗜好的读书,愿意贡献一点小小的意见:(一)少读中国书,多读外国书;(二)少捧国粹,多捧‘人粹’。”接下来的论述,引证鲁迅的《青年必读书》和《十四年的“读经”》、宋平子的《国粹论》、章太炎的《广论语骈枝》,以及蔡元培关于公民道德的一段话。在同一篇文章中,“四大护法”全部出场,正所谓念兹在兹。能服善,肯表彰师友,而且语调不卑不亢,此乃许寿裳为人为文的最大特色。

在《怀亡友鲁迅》一文中,许寿裳称,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,这25年中,“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,相知之深有如兄弟”。这并非高自标榜,许广平也曾描述鲁迅与许寿裳的“兄弟怡怡之情”:

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,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,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,无不包罗。而彼此人事的接触,见闻的交换,可歌可泣,可喜可怒,都无不(?)遮瞒,尽量倾吐。这样的友谊,从来没有改变的,真算得是耐久朋友,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,如此长久相处的,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。

所谓“师友情谊”,与学问大小没有关系。就像今人之谈论陈寅恪与吴宓、钱锺书与郑朝宗,如果非要挑剔双方学问上是否旗鼓相当,未免过于势利了些。许寿裳的思想不及鲁迅深刻、文章也不如鲁迅华美,但二人之间生死不渝的情谊,值得我们永远怀念。再说,鲁迅孤寂的心灵,其实是需要亲人以及朋友的安慰与支持的。

表彰尊师的“大传”，与追怀好友的“回忆录”，不用说，后者更容易放得开。同样朴实真挚、情深意切，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的挥洒自如，与《章炳麟》的体例谨严，各有千秋。更重要的是，二书同样包含了大量第一手资料。许广平为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所撰《读后记》，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赠《章炳麟》：

回忆是不轻的沉痛。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，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，值得珍贵，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。就是吉光片羽罢，也弥足珍视的了。除了许先生，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？

不是肯不肯，而是能不能。没有几十年的交谊以及足够的崇敬之心，还有大致与之相副的笔墨，是写不出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以及《章炳麟》这样的好书的。

五 荡开去的笔墨

撰写传记时，不管是专书还是单篇，许寿裳总喜欢荡开去，引入一些个人交谊以及生活琐事。这样一来，文章不刻板，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。清初黄宗羲在《论文管见》中称，善于经营文章者，除了“三史八家”，深厚的学识，还必须添上“竹头木屑”以及“常谈委事”。否则，文章洁是洁了，但没有生气。对“传记文学”有过专门研究的许先生，肯定懂得这个诀窍。

轮到我来谈论许先生及其著述，同样希望将笔墨荡开去。像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一样，我之关注许寿裳，最初确实是由于鲁迅以及章太炎的缘故。许著之由“资料库”变成“研究对象”，很大程度缘于两次有趣的游历。十年前，在东京大学访学时，我曾对照旧地图，从鲁迅及许寿裳等居住的“伍舍”，步行到章太炎讲学的民报社旧址。经历过1923年关东大地震，以及“二战”末期美军的大轰炸，民报社遗址云云，自是荡然无存。穿行于车水马龙之间，遥想八九十年前的往事，只能说是一种“心灵的游历”。但冥冥之中，感觉上离章太炎、周氏兄弟、许寿裳等又走近了一步。

前年秋冬，我有幸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讲学一学期。上任的第二天，系主任送了一册刚刚印制完成的《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（1929—2001）》，其中的“沿革”部分称：1945年台湾光复，国民政府接收这所创办于1929年的“台北帝国大学”，改名“国立台湾大学”，并将原文政学部分解为文学院与法学院；文学院下设中文、历史、哲学三系，台大中国文学系于是得以正式成立：

唯当时百废待兴，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、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代为选聘教员，参与规画（划）。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中由许寿裳、乔大壮二先生相继担任系主任，二先生旋相继去世。三十七年八月，台静农先生出任系主任，其后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，对本系之稳定与发展贡献甚巨。

细读“年表”及“传记”，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：比如，1948年2月许寿裳被害，一个月后，原本任教于台师大的许世瑛被台大中国文学系聘为兼任副教授（13页），1952年8月改聘为兼任教授（17页），1972年7月方才离职（45页）。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，这位小许先生可是大名鼎鼎，耳熟能详：五岁时鲁迅为其开蒙；上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时，鲁迅为其开列书目。又比如，台大中国文学系早年诸多名教授，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，如毛子水、董作宾、洪炎秋、戴君仁、台静农等，再加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骞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董同龢，难怪我到此讲学，有“宾至如归”的感觉。

我的办公室在文学院二楼，正对着为纪念傅斯年校长（又一位北大校友！）而建的“傅钟”，每回在走廊里漫步，想象着许寿裳、毛子水、台静农等我熟悉并景仰的先辈，也曾在这里徜徉、攀谈、嬉笑，有一种充实且幸福的感觉。或许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历史文化氛围”吧。记得周作人说过，“我们于生活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”。看花、听雨、闻香、喝不求解渴的茶，还有，追求生活在历史文化氛围中，这些“无用的装点”，确实像周作人所说的，“愈精练愈好”。

真没想到，回北大一年后，我再次遭遇许寿裳先生。不过，这回是在书本上。拜读过许先生的诸多著述，最想推介的，还属《章炳麟》。那是因为，许先生所撰鲁迅各书，包括1947年10月上海峨眉出版社初刊、1953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的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，以及1947年6月台湾文化协进会初刊的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》、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编的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等，广为研究者阅读与征引；需要专家“导读”的，是相对落寞的《章炳麟》。

说《章炳麟》“落寞”，也只是相对而言。1986年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林辰编《许寿裳文录》，其中的《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》一文，实即《章炳麟》第三章；1987年，重庆出版社推出了重排的《章炳麟》。这两种书，各印了千余册，依据的都是“字迹模糊之处甚多”的土纸本（重庆胜利出版社，1945）。2003年，上海百家出版社刊行倪墨炎、陈九英编《许寿裳文集》上下卷，其中《章炳麟》一书用的是1946年南京胜利出版公司的本子。上海版收罗颇广，除几部专门著作外，更旁及集外文、诗集、书信以及纪念文录（据《编辑说明》，此举得益于许先生家乡先后出版的《许寿裳纪念集》、《许寿裳诗集》、《许寿裳书信选集》等），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

即便如此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一册轻便且校勘精良的《章炳麟》，还是十分必要的。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重刊《章炳麟》，这我很赞同。只是许著大量引证章太炎的文章，必须认真校勘，方可可读。对此，我寄予厚望。

2004年2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新居
（原刊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04年3期）

CONTENTS

目 录

- 1 前言 作为著述家的许寿裳 / 陈平原

第一章 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

- 3 第一节 绪 言
- 7 第二节 满洲政府的罪恶
- 10 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沦没
- 17 第四节 帝国主义的猖狂
- 20 第五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

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

- 25 第六节 幼年期的民族思想
- 29 第七节 会见国父痛驳康有为时期
- 32 第八节 光复会时期
- 35 第九节 入狱时期
- 40 第十节 编辑《民报》时期
- 46 第十一节 功成后的做官
- 50 第十二节 功成后的被幽囚

第三章 国学大师的章先生

- 57 第十三节 治学与师友
- 62 第十四节 革命不忘讲学
- 67 第十五节 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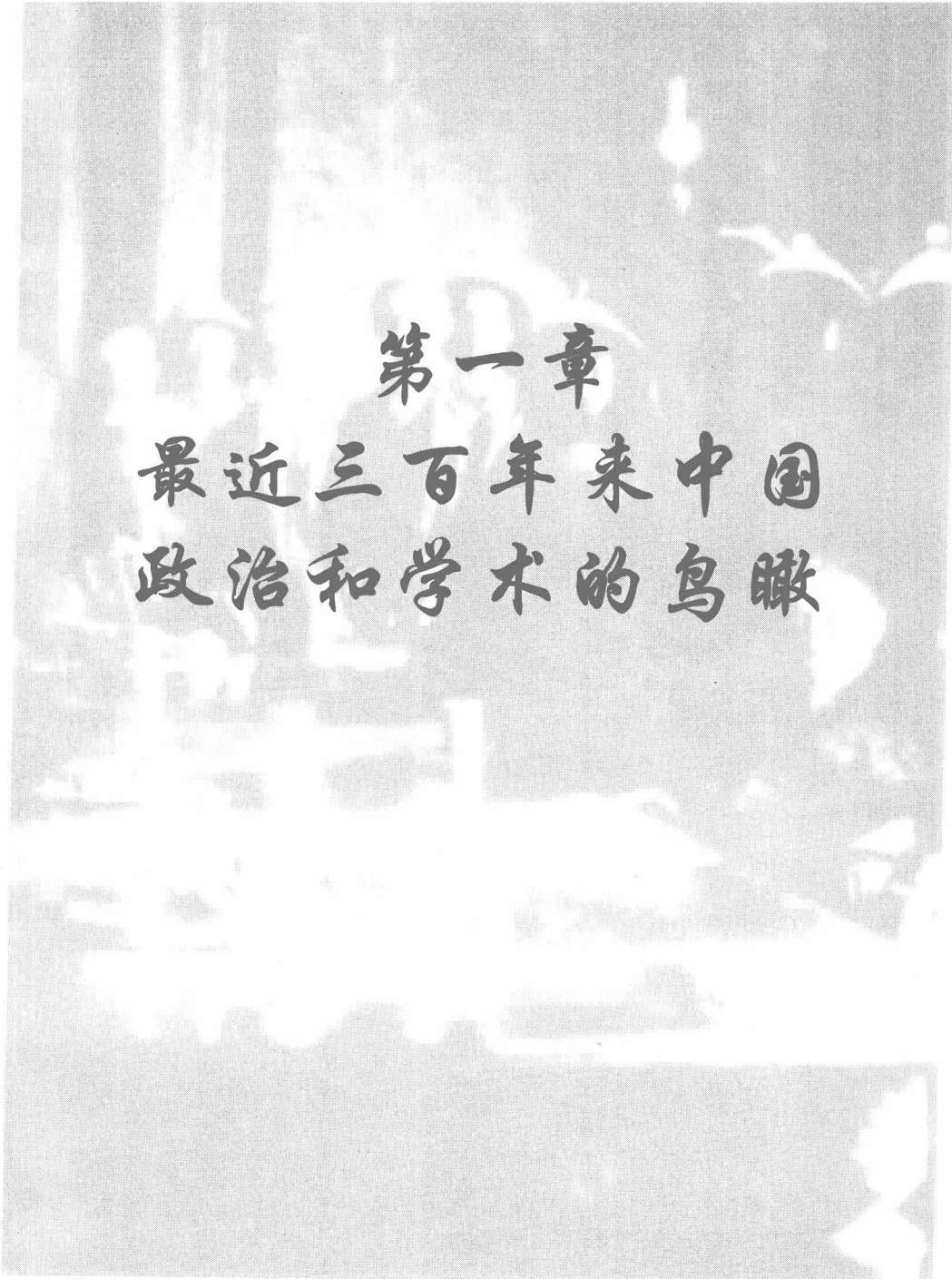
- 73 第十六节 文学上的贡献
- 78 第十七节 史学上的贡献
- 93 第十八节 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
- 102 第十九节 对于中印文化沟通的期望

第三章 先生晚年的志行

- 109 第二十节 对于甲骨文的始疑终信
- 111 第二十一节 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
- 114 第二十二节 先生的日常生活
- 117 第二十三节 “学而不厌·诲人不倦”

◇ 附录

- 123 附录一 著作简表
- 125 附录二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/ 鲁迅
- 128 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/ 许寿裳
- 137 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/ 汤国梨(口述) 胡觉民(整理)
- 164 章太炎先生在狱佚闻录 / 张篁溪
- 168 民报社听讲 / 周作人
- 171 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 / 曹聚仁
- 175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/ 陈存仁
- 191 章太炎师门的晨课
——几幅值得纪念的照片 / 陈存仁
- 196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(1868—1936) / 左舜生
- 201 国学大师章太炎 / 薛慧山
- 209 章太炎先生 / 曹聚仁
- 212 太炎先生言行轶录 / 吴蔼林
- 219 章太炎被羁北京轶事 / 徐一士
- 234 记章太炎及其轶事 / 周黎庵



第一章

最近三百年来中国 政治和学术的鸟瞰



第一节 绪 言

革 命 元 勋

章先生名炳麟，字枚叔，爱慕昆山顾炎武的为人，改名曰绛，别号太炎。是革命元勋，同时是国学大师。这个革命的意义是什么？只要一看那时代的背景，便可了然。先生以公元一八六八年（民国纪元前四四年，即清同治七年），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，生年比国父小二岁。那时候，正是中英缔结不平等条约——《南京条约》后二十四年，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后八年，太平天国的运动被消灭后四年。从里面看，清政府的腐败一天厉害一天；从外面看，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天沉重一天。但是当时士大夫们苟且偷安，懵然无觉。所谓优秀分子者，也不过或言变法，或谈立宪，议论纷纷，徒乱一般人民的视听。自从先生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，“首正大义，截断众流”，又和国父相见定交，同谋革命，先生的文字鼓吹的力量，特别来得阔大壮美。因之遭逮捕，入幽牢，百折不挠，九死无悔，而后国民感慕，翕然从风。其于民国艰难缔造之功，国父而外，实为第一，所以称之曰革命元勋。



章炳麟